

壹

姜德明先生在《读孙犁的散文》一文中,有一段文字值得特别关注,他写道:“写说真话的散文,是巴金揭起了这面大旗,并且热情地身体力行,是大声疾呼。孙犁没有站出来呐喊,却在默默地进行实践。他们一南一北,不约而同地为文坛上鼓吹着这股正义的风气,为当代不同层次的作家们树立了楷模。两位作家走上文坛的时间不同,个人的教养和生活经历不同,认识社会、表现生活的方式,包括个人的习好和文艺观点都未必相同,但他们肯于讲真话这一点却是相同的。”(《孙犁书札·致姜德明》第131页)

我对姜德明先生的这段论述是完全赞同的,因为他所说的确实是事实。不过,世人对巴金先生“要讲真话”的大声疾呼,所知甚详所传甚广;而对孙犁先生的“要说实话”,却似乎未能深入地研究和论列,这多少有些令人惋惜。

我在这里引用的“要说实话”四字真言,出自孙犁先生的一篇文章《通讯六要》。其“六要”的第一要,标题就是“要说实话”。在文章中,孙犁写道:“自从林彪公开提倡说谎话有利以来,对社会风气,对国家民族,对人民生活、思想的危害,大家是深有体会地看到了。但说谎话可

以走运,说真话可能倒楣的思想流毒,一时还不能肃清。”所以,孙犁提倡“要说实话”!

孙犁先生的这篇文章,写于1979年4月17日。据此算来,孙犁提出“要说实话”,单就时间而言,还略早于巴金先生的“要讲真话”。

据查,巴金先生的《讲真话》一文,写于1980年9月20日。此后又连续写了几篇文章:《再论真话》写于10月2日;《三论讲真话》写于1982年3月12日;《说真话之四》写于1982年4月2日;《未来(说真话之五)》写于1982年4月14日。可见,巴金先生确实是在奋力疾呼、大声呐喊的。他的声量和力度,显然要比孙犁大得多,影响也更为深远。

在此,我要特别申明一下:做这样一番回顾,绝非评点巴老和孙老二公之高下,两座高峰,各有其巍峨险境,根本无法简单比较,似乎也无可必要。我如此回顾,只是在姜德明先生“一南一北”之论的启发下,对“讲真话”和“说实话”之先后出现,进行一个简单的“复盘”。由此引申出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,那就是:几乎在同一时期,南北两位文学大师,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同一个命题,其意义显然是不同寻常的。

贰

恰如姜德明先生所言:“孙犁没有站出来呐喊,却在默默地实践着。”确实,孙犁并没有写成系列文章论述“要说实话”,但重读他的晚年论著,你会发现,他对真话的强调和对谎言的斥责,实际上也散落在他的散文杂文论说文以及书札和书衣文字间,可以说是贯穿于孙犁论著的字里行间,成为他晚年为文的一个重要主题——

他说:“这些年来,有些文艺作品里的谎言太多了。作家应该说些真诚的话。如果没有真诚,还算什么作家,还有什么艺术?”(孙犁:《奋勇地前进·战斗》,见《晚华集》第177-178页)他说:“任何时候,正直与诚实都是从事文学工作必须具备的素质。如果谎言能代替艺术,人类就真的不需要艺术了。”(孙犁:《紫葺集》小引),见《孙犁文集·三》第511页)他说:

“大跃进的时候,你写那么大的红薯,稻谷那么大的产量,钢铁那么大的数目,登在报上。很快就饿死了人,你就不写了,你的作品就是谎言。”(《孙犁文集·三》第389页)他说:“我们总结反面经验教训,是为了什么?就是教我们青年人,更忠实于现实,求得我们的艺术有生命力,不要投机取巧,不要赶浪头,要下一番苦功夫。”(《孙犁文集·三》第391页)

他还专门论述“实事求是”对于写作是何等重要:“文章怎样才能写的又短又好?有时千言万语也说不清楚,有时说起来也很简单,这就是要‘实事求是’。……这些事件、人物、感想,都在你的身上、心上,有过很深刻的印象,然后你如实地把它们写出来,这就是‘实事求是’。一般说,实事最有说服力,也最能感动人。但是只有实事还不够。在写作时,你还要考虑:怎样才能把这一实事,交代得清楚,写得完美,使人读起来有兴趣,读过以后,会受到好的影响和教育,这就是‘求是’。”(《孙犁文集·续编·二》第354页)

在写给铁凝的一封信里,孙犁写道:“创作的命脉,在于真实。这指的是生活的真实和作者思想意志的真实。这是现实主义的起码之点。现在和过去,在创作上都有假的现实主义。……他们以为这种作品,反映了当前时代之急务,以功利主义代替现实主义。这就是我

所说的假现实主义。这种作品所反映的现实情况,是经不起推敲的,作者的思想意志,是虚伪的。作品是反映时代的,但不能投时代之机。凡是投机的作品,都不能存在长久。”(《芸斋书简》第252-253页)

在为《田流散文特写集》所写的序言中,他写道:“关于通讯、特写,现在我想到的,却还是一个真实问题。我以为通讯、特写,从根本上讲,是属于新闻范畴,不属于文学创作的范畴。……其真实性、可靠性是第一义的,是不允许想当然的。”(《孙犁文集·续编二》第190页)

在回答有关散文创作的问题时,孙犁同样强调真实、真诚、讲真话的重要性,他写道:“我们常说,文章要感人肺腑,出自肺腑之言,才能感动别人。言不由衷,读者自然会认为你是欺骗。……你有几分真诚,读者就感受到几分真诚,丝毫做不得假。”

他写道:“如果有时间,读一些旧报纸、旧期刊是有好处的。在三中全会以前,报刊上的文章,包括散文在内,虚假的东西太多了,现在找来一看,常常使人啼笑皆非。……但是,这种文风,曾经猖獗了若干年,要说是完全根绝了它的影响,也不是事实。”

他认为:“就散文的规律而言,真诚与朴实,正如水之于花木,是个根本,不能改变。……在一个不算短的时期中,在各个现实领域,虚假浮夸,不大遇到批评和制裁;而真实地反映情况,即说真话,却常常遭到难以想象的打击。这不能不反映到文学创作上。”接着,孙犁先生归纳出散文创作的四条不足之处:“一,对所记事物,缺乏真实深刻感受,有时反故弄玄虚;二,情感迎合风尚,夸张虚伪;三,所用辞藻,外表华丽,实多相互抄袭,已成陈词滥调。四,因以上种种,造成当前散文篇幅都很长。欲求古代之千字上下的散文,几不可得。”

在孙犁先生所列举出的这三条“不足之处”中,前两条皆与“说实话”的命题直接相关。可见他对这一问题是何等重视。(《孙犁文集·续编二》第202-203页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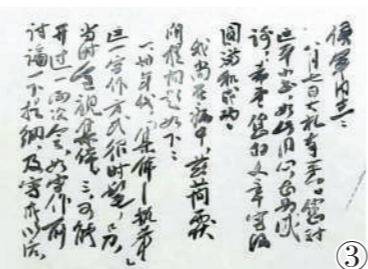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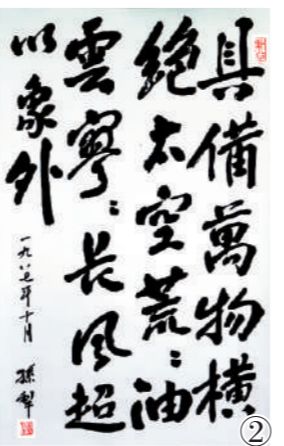


孙犁先生诞辰 110周年 (1913.5.11—2023.5.11)

●重读孙犁系列随笔有感

“要说实话”

侯军



图①孙犁在练习书法
图②孙犁的书法
图③孙犁致侯军的信

叁

孙犁不仅倡导“要说实话”,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,不论谈话还是作文,都是有话直说,从不拐弯抹角。为此,他遭遇过各种非难和误解,抱怨和物议,甚至老友断交,“名家”攻许,令他深陷烦恼。但他择善固执,一以贯之,宁可忍辱负重,承受责难,也绝不说虚话套话,更不说谎话。这样的实例,在孙犁几十年的文字生涯中,真是屡见不鲜,俯拾皆是。兹举其晚年为老友所写悼文、序文二例以证之——

其一:1978年,孙犁饱含深情,写出一篇回忆老友远千里的散文《远的怀念》。写得很真诚,所有素材皆来自作者与主人公的直接交往,行文冲淡,感情内敛,情蕴于中,亲切生动。当然,孙犁也没有刻意拔高,甚至没用任何“高级”形容词。这篇悼亡之作,如今已经成为孙犁晚年散文的经典之作。然而,对这篇文章,远千里夫人于雁军却很不满意,认为评价不够高,要求改得完美一些,否则不宜发表。还说要另外找“大人物”再写。(见段华《孙犁年谱》257页,又见于谢大光《孙犁教我当编辑》第136页)

于雁军本人也是散文家,与孙犁也是老朋友。照理,她完全能看懂这篇文章的价值。然而事与愿违,璞玉未识。孙犁闻知,心情自然郁闷。但他坚持认为,对老朋友同样要实话实说,不可溢美。他在《近作散文的后记》中,对此做出直接而明确的自己的打击:“我所写的,只是战友留给我的简单印象,我用自己的诚实的感情和想法,来纪念他们。我的文章,不是追悼会上的悼词,也不是组织部给他们的结论,甚至也不是一时舆论的归结或摘要。我所写的是我们共同战斗经历的一些断片。我坚信,我的伙伴们只是平凡的人,普通的战士,并不是什么高大的形象,绝对化了的人。这些年来,我积累的生活经验之一,就是不语怪力乱神。……我谈到他们的一些优点,也提到他们的一些缺点。我觉得不管生前死后,朋友同志之间,都应该如此。”(《孙犁文集·五·杂著》第147页)

事实上,孙犁不论评点作品还是记事怀人,他笔下流出的文字,皆是实话实说,不矫不饰。尽管他明明知道:“凡是提了些不同看法的,以后的关系就冷了下来;凡是只说了好处,没有涉及坏处的,则往来的多了一些。”“文事关乎人情冷暖,笔墨浸透世态炎凉,他的‘实话’,说得并不轻松。

其二:1982年,孙犁应老友之请,为其诗集作一序文。依照他一贯的“实话实说”的原则,他在序文中没有拔高,没有溢美,也没有回避其不足,只写了一些亲见亲闻和真切感受。孙犁自谓:“对诗作虽无过多表扬,然亦无过多贬抑。”谁知,这篇序文竟招致这位老友的极度不满,先是拍来电报,令孙犁“万勿发表”;随即发来一封信,称如将此文用在书上,或在任何期刊发表,都将使他处于“难堪的境地”。孙犁一面急忙撤稿,一面写信解释和安慰。但对对方回复的又是一封加急电报,要求一定把序文撤下,以免影响诗集出版云云……

孙犁先生彼时彼刻的心情不难想象——“这真是当头棒喝,冷水浇头,我的热意全消了。电报在我手里拿了很久,若有所思,亦有所感。”他的所悟所感,就汇集成一篇剖切沉痛的《序的教训》。他写道:“序者,引也。评论作品,说好话,固是一格,然此亦甚难,如胡乱吹捧,虽讨好于作者,对广大读者实为欺骗。”接着,他直言所感:“我为人愚执,好直感实言,虽吃过好多苦头,十年动乱中,且因此几至于死,然终不知悔。老朋友如于我衰迈之年,寄希望于我的谀媚虚假之词,那就谈不上是互相了解了。”在文章的末尾,孙犁特意引述了一段这篇“遭拒”的序文的末段:“我苟延残喘,其亡也晚。故友旧朋,不弃衰朽,常常以序引之命负责。缅怀往日战斗情谊,我也常常自不量力,率意直陈。好在我说错了,老朋友是可以谅解的。因为他们也知道我的秉性,不易改变,是要带到土里去的了。”引罢这段文字,孙犁慨叹一声:“今天看来,我这些话说的有些太自信了。”于是,他果断宣布:“从今而后,不再为别人作序,别人也不要再以此事相求。”(《孙犁文集·续编三》第254页)

这种决绝,有此后的岁月作证——孙犁先生真是说到做到了!

肆

1992年,贾平凹创办《美文》月刊,向孙犁先生约稿。孙犁给他写了一封信,以致祝贺,同时也借机表达一下自己对“美文”这一话题的看法。文章中,孙犁秉持一贯的“要说实话”的原则,对当时文坛的一些不良风气和做法,提出直言不讳的批评,其中有一段涉及修辞语法,他是这样写的:“我仍以为,所谓美,在于朴素自然。以文章而论,则当重视真情实感,修辞语法。有些‘美文’实际上是刻意修饰造作,成为时装模特。另有名家,不注意行文规范,以新潮自居,文字已不大通,违背美文。例如这样的句子:‘未必不会不长成青枝绿叶’,他本意是肯定,但连用三个否定词,就把人绕糊涂了。这也是名家之笔,一篇千字文,有几处如此不讲求的修辞,还能谈得上美文?”

孙犁是做编辑出身,对作品的语法修辞十分重视且非常敏感。他又是一个文艺评论家,评点各种文学作品和文化现象,向来直言说理,从不拐弯弯绕。基于这两点,在孙犁看来,指出文章中的瑕疵,原本是十分正常的。他曾给好友韩映山写信述及写作此文的情形:“我写文章,一向随便,也很少考虑后果。因为写时,确是无意得罪人的。比如信中那个病句。我与该人素不相识,也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作品,这哪里谈得上恩怨?我给贾平凹写信,要举个例子,正好身边有一种南方赠阅小报,不知怎么,就有那么一句话,映进我的眼帘,就随手用了,也没有看上下文。又因为是信,文字也未修修改改,也没想到发表,就寄出去了。”

谁知,这一个随手用上的“病句”,却捅了马蜂窝,招致原作者(姑妄称之为“病句名家”吧)连续三年的纠缠攻许,讽刺挖苦,有些话已近乎人身攻击了,例如:1993年年初,此“病句名家”发文,标题就是《要么回家,要么闭嘴》,文章并不直接回应“病句”之“病”,却岔开话题,直接攻击“长者行文”:“如果为了

自己在文坛引领风骚,将一切后来人都扫荡干净,就剩下几位迎风掉泪,下楼腿颤,松竹梅岁寒三友,不觉得孤单么?”此后,他就一路抓住“老”字,大做文章,极尽挖苦奚落之能事,说“个别作家,一旦到了写不出什么作品的时候,便像妇女失去生育能力,进入更年期,开始不安地折腾。折腾自己不算,还要折腾别人。……”(转引自苑英科著《岷然独立:孙犁纷争》第169页)

别人指出你一个“病句”,你可以争辩此句一点病都没有,很好;但他不去争辩这个,因为无可争辩。于是,心中积怨生恨,却无端攻击指谬者之老脸,不断找出各种稀奇古怪的例证,将其臆想的老人之缺点毛病,全加于指谬者,去攻击对方“老而糊涂”“老而张狂”“老而失志”“老而不识时务”,甚至讽刺是老年人“性别别扭”。“老实说,这世界上最难看的,莫过于那些老先生见到女士时的一对七老八十的眼睛,于晦暗木然中迸出的一股邪光了”……(转引自苑英科著《岷然独立:孙犁纷争》第173页)

不愧是“名家”,确实词汇丰富,想象力强盛,却好像没用对地方。一个“病句”,引来如此无聊且恶毒的攻击和中伤,而且一直不依不饶,变本加厉。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文坛出现,本身就很不正常。孙犁先生一直沉默着隐忍着,一直忍到第三年,他的忍耐度达到极限,这才不得不提笔应战——

自1994年9月2日在《羊城晚报·花地》发表《病句的纠缠》一文开始,他连续在南方的《羊城晚报》《新民晚报》等副刊上,发出了八篇檄文,即《当代文事小记》《文场亲历摘抄》《我和青年作家》《我与文艺团体》《我观文学奖》《反嘲笑》《作家的文化》。这八篇文章,摆事实,讲道理,不温不火,绵里藏针,从对方立论中的荒谬处,撕开论题,深入剖析,层层剥茧,招招击中命门。且笔锋冷峻,行文老辣。他的文章,既不回避年老的话题,也不躲闪对

方的锋芒,而是正面迎战,直对箭簇,依旧秉持着“实话实说”的精神,逐一驳倒对方的论点,同时也尖锐指斥文坛乱象。如,针对对方讽刺“老说告退,又死盯着文坛”,孙犁直言:当今文坛越来越像官场,他愤然写道:“呜呼!文坛乃人民之文坛,国家之文坛,非一人一家,一伙人之文坛。为什么不允许别人注视它,这能禁得住吗?可怜的是,文坛上的一些人物,不自爱重,胡作非为,人民已经不愿意再关心和爱护这个坛口了。”(孙犁:《曲终集》第116页)

对于“病句名家”一再从生理上对老年人进行人身攻击,孙犁强忍内心愤慨,文笔却异常冷静:“谈论文章,言不及义,不从文字上立论,反过来在生理上嘲笑老年人,这是鲁迅所说的‘粪帚战术’。文格至此,其人可知,尚可与之争辩乎!我真的应该‘回家闭口’,养养精神了。”(孙犁:《曲终集》第119页)

八篇文章密集发出后,对方顿时“哑火”,至少没有看到他再发什么纠缠文字。而孙犁这边也是一战收兵。他在写给《羊城晚报》编辑的信中,直言:“我非好斗之人,实在忍无可忍,才略为反击一下。至此,告一段落,再写则近于无聊。”在写给韩映山的信中,则说得更加实在:“我九月份写了八篇文章,其中两篇为旧稿。因为是在激怒的情况下写的,可以说是大放厥词,百无顾忌,大有姜太公在此,诸神退位的味道。这还能得罪人?这已不是四面树敌,而是八面树敌了。发了一阵,气消了,也就觉得无聊,就不再写了。”(以上两信均见于《孙犁全集》第11卷)

有人把这场“病句”之争,归之为文坛的一场“论战”。其实,在我看来,这更像是孙犁先生以八十高龄,不得不奋起应对的一场“自卫之战”——他所捍卫的,不只是个人的人格尊严,更有他所珍视的“实话直说”的磊落襟怀!

想想看,是不是有些悲壮? 如果还是从时间上“复盘”一下,我们发现,前面这三个典型案例,分别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、八十年代和

九十年代。这就是说,在孙犁先生的晚年,为“说真话”而进行的努力和坚守,是贯穿始终的。进而言之,在孙犁先生一生的文字生涯中,“要说实话”这四字真言,他说到做到了。正如贾平凹在《孙犁论》中所说的:“一生中凡是白纸上写出的黑字,都敢堂而皇之地收在文集里,既不损其人亦不损其文,国中几个能如此?”(《百年孙犁》第151页)

在此不妨借用一句佛家禅理:因其真实不虚,故而无有恐怖,远离颠倒梦想。

然而,同样令人喟叹的是:就在这场“自卫战”收兵之后,不到一年时间,孙犁先生就宣布彻底“封笔”——依旧是那么决绝,依旧是说到做到!

今年,是孙犁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;距孙犁先生“封笔”,亦已三十年。回望前尘,斯人永驻;抚卷思之,能不感喟!

伍

公理,孙犁先生一路走来,身心俱疲,伤痕累累。但他初心不改,勇毅前行。每一次坚持,最终受到伤害最大的还是孙犁先生——这是“说真话”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,很沉重也很自伤。也许有人认为很不值。尤其是“病句”所引发的那场论战,正值孙犁先生身患重病之际,他在忍受病痛折磨、入院手术的同时,还要承受明枪暗箭的攻许和人身尊严的羞辱,其痛苦和愤懑可想而知。然而,孙犁先生却是岷然挺立,奋力独撑,独自一人,抵挡刀剑——他曾经跃跃欲试的青年人,也力阻愤而欲发拔刀相助的友人们,不让旁人参与这类“粪帚”之争,甘愿孤军奋战——他就像战争年代一样“以笔为枪”,奋力做此最后一搏!

想想看,是不是有些悲壮? 如果还是从时间上“复盘”一下,我们发现,前面这三个典型案例,分别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、八十年代和